

台北故宫藏《射阳先生存稿》述略*

蔡铁鹰

《射阳先生存稿》是明人吴承恩的诗文集。吴承恩(1506-1580),字汝忠,号射阳,明淮安府山阳县(今江苏省淮安市)人。吴氏以作小说《西游记》而著称,但实际上他还是明代中后期嘉、隆、万间颇有成就的诗文作家:青年时曾与誉满一时的大名士文徵明、王宠有诗文唱和;中年时曾与何良俊、何良傅等一批号称“白下风流”的江南才子结社交往;晚年则曾与“后七子”中的徐中行等人把臂秉烛,“论文论诗不倦”;甚至还因为文学主张不同,与被后人视为“唐宋派”中坚人物的归有光齟齬而身陷囹圄。当然,可贵的还不是这些经历,还在于在明中期以后文坛习惯于风从影动、标榜口号的生存环境下,吴承恩能卓然独立,杜绝攀援,自成一家。

万历间小有名气的文坛人物、曾任淮安知府的五岳山人陈文烛对吴承恩诗文就有相当高的评价:“汝忠谓:文自六经后,惟汉魏为近古;诗自三百篇后,惟唐人为近古。近时学者,徒谢朝华而不知畜多识,去陈言而不知漱芳润,即欲敷文陈诗,溢缥囊于无穷也,难矣!徐先生(按:“后七子”徐中行)与余深韪其言。今观汝忠之作,缘情而绮丽,体物而浏亮,其词微而显,其旨博而深。”(《吴射阳先生存稿叙》)再后来名噪一时的李维桢也有很独到的评价:“汝忠于七子中所谓徐子与者(按:徐中行)最善,还往倡和最稔。而按其集,独不类七子友,率自胸臆出之,而不染于色泽,舒徐不迫,而亦不至促弦而窘幅。……大要汝忠师心匠意,不傍人门户篱落,以钓一时声誉,故所就如此。”(《吴射阳先生集选叙》)

至于两篇序中所谓“书记碑叙之文,虽不拟古何人,班孟坚、柳子厚之遗也;诗词虽不拟古何人,李太白、辛幼安之遗也”(陈文烛语)、“诗在唐与钱、刘、元、白相上下,而文在宋与庐陵、南丰相出入”(李维桢语)之类,虽有夸张,但显然也并不完全是不根之谈。

由于家贫无嗣,吴承恩的诗文生前没有结集,直到万历八年去世之后,才由他此时已走入仕途的表外孙丘度(官至光禄寺卿)着手整理。万历十八年(庚寅,1590年)书成付梓,命名为《射阳先生存稿》行世。吴承恩的旧友陈文

*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《吴承恩年谱编订及诗文集整理》中期成果,项目批准号:11YJA751003。

烛作序(《吴承恩先生存稿叙》),自称“通家晚生”的乡人吴国荣作跋(《射阳先生存稿跋》),略述吴承恩生平及《射阳先生存稿》刻印经过。二十馀年后,丘度谋划重订《射阳先生存稿》,他把补充搜罗的吴氏诗文,交请当时的文坛名家李维桢甄选,李维桢不辱挚友之托,甄选之外又认真地为这重订本写了序言《吴射阳先生集选叙》。这几篇序跋现在都是研究吴承恩的重要文献。

从现存资料来看,明末至清初的一段时间内《射阳先生存稿》的流播还算广泛,因为曹溶的《明人小传》、陈田的《明诗纪事》、朱彝尊的《明诗综》中均有对吴承恩或《射阳先生存稿》的介绍收录。但乾隆年间编选《四库》之后,大约由于吴承恩身份不显,未能入选《四库》,《射阳先生存稿》便逐渐难寻,乾隆后期吴玉搢编《山阳志遗》、道光年间丁晏编《山阳诗徵》时,似乎就没有见过完整的《射阳先生存稿》,只在1929年于北平故宫发现一部海内孤本。而由于这部孤本1949年被运去台湾入藏台北故宫,所以事实上近几十年来大陆学者都没有见过此书。

1929年北平故宫在藏书中发现两册四卷的《射阳先生存稿》时,也颇为重视,随即在《故宫周刊》本年12月开始,连续选载各体诗文若干,直至1930年11月,随后又在这一年刊出了一个完整的铅排本,这个铅排本便是今天所见的《吴承恩诗文集》的主要底本。根据这个铅排本,刘修业先生整理出了一部《吴承恩诗文集》,1958年由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。1991年,上海古籍出版社约请刘怀玉先生在刘修业前本的基础上再作校笺,出版了《吴承恩诗文集笺校》,成为大陆至今通用的版本。二位刘先生为这部《吴承恩诗文集》的校勘付出了很大的努力,除以《故宫周刊》的选载参校以外,还找出了几乎所有收录吴承恩诗文的文献,如《淮安府志》、《山阳县志》、《山阳诗徵》、《楚州丛书》等,在当时的条件下,校勘应称精审。但由于故宫铅排本原就有粗糙的先天缺陷,《吴承恩诗文集》虽然纠正了很多脱文和误字,然而从文献整理的角度看,遗憾仍然殊多。

2009年秋,笔者得见这部署为“万历庚寅”(十八年)刻本的台北故宫藏《射阳先生存稿》。

该书四卷,分为两册,两册的封面上分别注有“卷一至二”、“卷三至四”字样。全书高26.5公分,宽16.5公分;版心高20.5公分,宽13公分。每页十行,行二十二或二十三字,除少数补版页外,绝大部分刻工精细,字迹清晰。第一卷目录前有陈文烛落款万历庚寅的《吴射阳先生存稿叙》,三叶六页;李维桢无年月款的《吴射阳先生集选叙》,四叶八页,每页均六行十二字。第四卷末有吴国荣落款万历己丑的《射阳先生存稿跋》,草书大字,每页六行。

对《射阳先生存稿》作仔细观察以后,围绕大陆现行《吴承恩诗文集》的一些疑团便迎刃而解,主要可以归纳为:

1. 有助釐清现存《射阳先生存稿》的版次。如前所述,《射阳先生存稿》有万历庚寅(十八年)的初刻本和二十馀年后的重订本。以往研究者只知道尚有

一部《射阳先生存稿》存世,但不知究竟是哪一版次。现在我们则可以肯定,存世的是万历四十年左右的重订本,理由很简单:前有李维桢叙述重订事略的序言在。由于李维桢序的落款没有年月,今台北故宫本仅根据陈文烛序言的落款而署为“万历庚寅”,实在是搞错了。

2. 基本可以确认吴承恩存世诗文的全貌。吴承恩诗文的数量应该很多,但大多早已亡佚,故吴国荣《射阳先生存稿跋》说丘度搜集到的仅仅是“存十一于千百”。对早年亡佚者我们已经不存复见奢望,但李维桢在重订《射阳先生存稿》时说“丘公……复搜集玉叔(按:陈文烛字)所未及录者,已,病其太繁,属不佞校删而为之叙”,这句话很有想象空间:既然有增有删,动作不能算小,原刻本是何样子,删掉哪些,被删的还能见到吗?因此研究者们下意识中也留下了有朝一日那些曾经刻进《射阳先生存稿》初刻本而后又被删去的诗文能重见天日的念想。而现在根据台北故宫藏本的字体、纸张、页码等可以辨认出,重订本利用了万历十八年初刻的旧版,较之旧版增多删少,主要有:卷一删去七律两首,增加了另两首七律和两篇赋;卷四增加十三篇障词、十七首词(十二个词牌)以及一个由九支曲子组成的套曲。由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得出结论:这个重订本所反映的基本就是吴承恩去世时存世诗文的全貌,李维桢“病其太繁”,所指仅仅是丘度后来补充的部分而不是初刻本吴承恩诗文的全部,因此成批发现吴承恩佚作的可能已不存在。

3. 对吴承恩诗文的整理、校勘有极大帮助。如前述,现行《吴承恩诗文集》的底本是1930年北平故宫的铅排本,铅排本的面世匆忙粗糙,有严重的先天缺陷。尽管后来的整理者付出了艰辛的努力,但今日传世的吴承恩诗文作品中仍可以读出疑误难解之处。如《对月感秋》有“萍水香烟晚”句,不可解,现在我们发现实为“萍水香晚烟”之误;《富贵曲戏效温飞卿体》有“烧迷烛妆阁”句,实为“烧烛迷妆阁”之误;《赠宗万湖令江山》有“凤凰百禽仪,千将万金宝”,“千将”实为“干将”之误;《述寿赋》有“吾若望子以万箱,益之以干驷”,“干驷”实为“千驷”之误。有些错误,则可能引起歧义,如吴氏有诗《平河桥》:“短篷倦向河桥泊,独对青溪枕臂眠。日落牛蓑归牧笛,潮来鱼米集商船。绕篱野菜平临水,隔岸村炊互起烟。会向此中谋二顷,闲搯藜杖听鸣蝉。”一般认为这首诗写实,平河桥就在吴氏墓地附近(今称平桥镇),说这首诗既反映了吴氏的理想和情趣,应是吴承恩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,同时又是确认吴承恩本人墓地的重要参考诗证。但诗中“青溪”一词存疑,因为淮安无山,有水但不称溪,既然诗中有溪就未必一定是写在淮安。现在从故宫《射阳先生存稿》中看到“溪”实为“旗”——酒店作为幌子的“旗”,恢复这个字,就了解读中的疑问。

作者工作单位:江苏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